

航站楼

巢骏至

离家久了，“航站楼”倒也成了一种别样的文化符号。难以释怀的过去，转瞬即逝的当下，与迷惘遥远的未来，循环往复地呈非线性流动，相遇、交织，而作别于空间与时间中一个平常而反常的节点。这或许就是对人生的一种隐喻吧，我们一次次地踏上旅途，或四海漂泊，或衣锦还乡。

向着亲人或爱人挥手告别，转身遁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用余光再瞥上一眼，把多余的想法锁进心底，与熟悉的人和事渐行渐远。在偌大的航站楼中，我们好似扁舟一叶，在摇曳星光下，撑过半人高的芦苇，渐渐驶向未知的远方。熟悉的家变得愈发陌生，蜕变为一个难以触摸的无形概念，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不用付租金的房客。我们在航站楼里举办着一场朴素的葬礼，送别过去。

航站楼，英文中作“terminal”，亦有计算机终端的意思。终端负责着输入与输出的使命，承载着人机互动的窗口，我们从其中获取必要的信息，以维持自身在这个日新月异、不断推进的现代社会的“会籍”，而不至于被时代的列车遗落在空空荡荡的站台上，在黑暗而冗长的隧道中迷失方向，跌入落后而迷信当道的中世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航站楼与终端都是对过去与未来的一种连接：飞逝的时间在交叉点短暂地停留，短如一毫秒，长至几个小时，直到一切重新启动，归于往常。

Terminal在英文中亦有铁路或是运输网络终点的意，也可指为某种无法治愈的顽疾。有意思的是，航站楼不仅仅是旅途的起点，亦是一段旅途的终点：回头的浪子在故乡熟悉而陌生的天际线前流下炽热的泪水，有人决意留下，生活归于平凡与柴米油盐，有人左右踱步，在犹豫不决中虚度一生，有人转身离开，开启一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行。每一种不同的选择，都指向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未来，而那时懵懵懂懂的我们却不得而知。

还记得小时候，我挺喜欢的一部影片便叫做“The Terminal”，译名叫《幸福终点站》。事实上，汤姆·汉克斯饰演的主角有个真实存在的原型，叫做梅赫兰先生，他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动乱余波中试图逃离伤痛过去，奔向崭新的未来，却因为官僚主义与其他种种原因被困于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航站楼中，十七年如一日，近乎永远地留在了时间的停滞点。与原型的故事相比，我总觉得好莱坞的编剧们与《幸福终点站》这个译名有些太过乐观主义了：正是时间的直线流动赋予了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生活在时间环形流动的航站楼中，我们对过去又有什么反思？对未来又将有什么展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梅赫兰最终被允许离开时，他却有了新的犹豫：失去了航站楼的庇护，他又该如何只身一人闯入外面的世界，适应不同规则下的生活呢？

我总思索，Terminal好似一个连续而永恒的莫比乌斯环，过去、当下与未来，转身离去、逡巡滞留与抵达终点，一切都井然有序地上演着，一个充满哲学性的隐喻，也是一段段真实的人生。环环相扣，循环往复，或许这便是“航站楼”发人深省的魔力吧。

不动，都会随着人潮汹涌被动地不断往前。这里的人上下班时会沿着某种既定的轨迹匀速前行，对于要去哪儿、做什么，他们仿佛都有一种笃定感。有想法的人，这里有大把的机会施展你的抱负。

这个分寸，似乎就是分寸。还读到过从另一个侧面说上海人的分寸的——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读了之后，莞尔。这个分寸，似乎也是分寸。

新生代的上海人，接受的是普通话语言和思维，以致，“份寸”有点讲不通了。我的新书《上海分寸》讲究的是上海人做事的“份寸”，若是由一位上海籍语音艺术家诵读，读出来的也是“份寸”，不过，写下来便是“上海分寸”。幸好，谁都能意会分寸是于细微中见卓著。

城市决定了城市的分寸意识，作用于人的行为和思维；人的行为和思维，又反作用于城市的分寸意识。

去过很多古镇水乡，一河二街，二河四街……古镇古风，当是不错的景致。但是你去沿河走一走，尤其是晚上，但见一个接一个的红灯笼，一面接一面的店家黄旗，却看不到月明星稀，看不到村舍幽深。镇依旧是古镇，风却不是古风。

我曾经把我的想法告诉古镇的朋友。朋友说，如今大凡和“古”有点牵连的旅游景区，都似乎是以红灯笼来证明自己身份的……

一件事情，当它原有的分寸失去之后，会形成新的格局，乃至固化为现象，再去改变它，恢复它原有的分寸，有时似乎也是一件破坏分寸的事情了。

分寸不是口号，也没有理论教科书，分寸是靠拿捏才能感觉是否得当的。上海的分寸，是上海人的拿捏，不在上海人的脸上，是在上海马路、建筑、弄堂、商店里，是在上海人的家庭、学校、亲情、朋友中……

分寸与份寸的牛角尖

马尚龙



在上海讲分寸，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分寸，有两个沪语读音版本。

分寸，在上海话中，很多人读作“fen-cun”，和普通话几乎一样，不过老派点的上海人，习惯说成“ven-cun”的，“分”和上海话中的“份”同音。上海话中，有些字，比如“糞”姓，可以读作“gong”，也可以读成“jun”；“分”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没有一字多音的读法，唯独在“分寸”上，失了分寸。

我一直求解分寸为什么会读成“份寸”。分和寸都是中国制式的长度单位，一尺有十寸，一寸有十分。讲究分寸，那就是讲究细小细微。《史记·苏秦列传》有这么一句：“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这大约是分寸的本义了。

但是上海话分寸意思的外延，不仅仅是长度，不仅仅是细小细微，显然还要大一点。分寸可能是大与小，多与少，深与浅，轻与重，敛与放……很有可能，上海人的分寸，本当是“份寸”。若是分寸，分和寸同义重叠，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份寸则不同，寸是长度单位，份是数量单位，两个不同的度量单位合二为一，既要在长度上精确，又要在数量上无错，这是复合型的要求。复合型是有难度的，份寸也就有讨论价值了——份寸恰好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是否成功的复合型考量。

其实北方话里就有“过份”一说，不过比起没份寸，过份就严重得多了。

曾经看到过一篇短文章，是非上海籍人士，写自己在上海遭遇的上海分寸——我在上海没有任何的亲戚、同学、朋友，工作的这三年，人际关系仅止于同事而已。我辞职，搬家，每次都有重新开始的感觉。我很爱上海的一点，是它似亲似疏的分寸和距离感令我感到安全，它太大了——大到没人会看到你的窘迫，你的失败在这里也会很不显眼。它把你裹挟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你就算原地

沐星子乱飞。我给这书包了个皮，专门留着出门时看。有时看着看着，困了，打一个吨，短梦里仿佛与老马坐在漂泊起伏的船上。醒来时望望火车或飞机的窗外，手里捏着书，嘴角还留着微笑，期待着也有老马一样幸运的旅程……

克斯很仗义，愿意帮忙，趁机提出想借那本《双重人格》。对方说还没看完，下火车时，不知疲倦的读者追着喊他，把书塞给他。一段旅程就在这样的惊喜中结束。四天后，马尔克斯冒着细雨去教育部撞大运，看到申请奖学金的人从楼里排满院子，他的心彻底凉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拍肩膀问他：“你在这儿干吗？”居然是那位“不知疲倦的读者”，听了缘由，他让马尔克斯跟他进楼，坐下来，马尔克斯才知道此公就是国家奖学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他读书有望了。“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同前，第167页）一首歌，一本书，一段旅程……马尔克斯说：“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同前，第161页）他应该补充一句：这节课不能缺了书。

马尔克斯的这本《活着为了讲述》，文采飞扬，忆起旧事，老马手舞足蹈，吐

伟”，就等于寒酸他、讽刺他、否定他啊。事实上，“居功甚伟”一词正确的用法是“厥功甚伟”。厥，也有多个义项，其中一个可作文言代词，相当于“其”。那么，“厥功甚伟”的实际意思明白无误了——（其他，他们等等）在某事上的功劳很大，语气、意思都到位了。《清史稿·一百三十七列传》：“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渠魁就歼，厥功甚伟。”可证。

“厥功”被乱用为“居功”，我以为很大的可能是“厥”与“居”的读音有点相近所致。

俄军打了胜仗，安德来公爵受库图佐夫指派去不偏不倚向奥国宫廷报告胜利的消息。信使是个美差，表明总司令大人的垂青和偏爱，据说这还是即将提升的前奏。安德来踌躇满志地去履行他的使命，皇帝见了，勋章得了，得意后他去了哪里呢？在他回到俾利平家之前，安德来公爵到书店去为行军期间储备了书籍，在书店里逗留了好久。”（《战争与和平》高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9月新1版）大师就是大师，托尔斯泰的笔，有力时如狂风暴雨，摧枯拉朽，那些历史的宏大场面一下子铺排出来；而细致处又似和风细雨，催生一棵小草，摇曳一滴露珠。这个买书的细节，就是大场面里不经意的一笔，却也恰如其分地写出安德来的喜好，让这个人物与读者越来越贴近。

旅途中的阅读

周立民

还差几十页没有看完，我是多么不想就这么合上书啊。——你看吧，本来沉闷和乏味的时光因为书变得大不一样。

其实，有很多人比我们忙得多，日理万机，然而，他们依旧手不释卷，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特别是“边角料”，把它们积攒起来，还是很可观。毛泽东就有旅途中带书、读书的习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一书记载，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出访前夕，他亲手挑选鲁迅著作作旅途中阅读。在苏联，外事活动之余，他就读书，读到津津有味时，还自言自语：说得好，说得好！（第183页）替他管理图书的逢先知曾记下一份书单，是毛泽东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随带的书，其中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还有全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几部佛经，《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今人的书有鲁迅、郭沫若、冯友兰、范文澜等人著作，还有地图……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多达上百种。外出期间，他的阅读量是惊人的。

马尔克斯也是一位阅读狂人。1943年1月，他离开家去波哥大碰运气，打算拿奖学金通过考试读高中。要先坐十天半个月的轮船，再换火车才能到。漫长的旅途，几个年轻人又唱又跳，打发时光。路途上，他遇到了一位“不知疲倦的读者”。（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版）马尔克斯路上也带了书，可是，令他羡慕的是这位老兄带了那么多书，其中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是他久觅不得垂涎已久的。可惜，他们一直机会搭话。机会出现在后来的火车上，这位不知疲倦的读者仿佛从天而降，他请求马尔克斯教他他们船上唱过的歌，他想学来讨好女友。马尔

克斯很仗义，愿意帮忙，趁机提出想借那本《双重人格》。对方说还没看完，下火车时，不知疲倦的读者追着喊他，把书塞给他。一段旅程就在这样的惊喜中结束。四天后，马尔克斯冒着细雨去教育部撞大运，看到申请奖学金的人从楼里排满院子，他的心彻底凉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拍肩膀问他：“你在这儿干吗？”居然是那位“不知疲倦的读者”，听了缘由，他让马尔克斯跟他进楼，坐下来，马尔克斯才知道此公就是国家奖学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他读书有望了。“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同前，第167页）一首歌，一本书，一段旅程……马尔克斯说：“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同前，第161页）他应该补充一句：这节课不能缺了书。

马尔克斯的这本《活着为了讲述》，文采飞扬，忆起旧事，老马手舞足蹈，吐

伟”，就等于寒酸他、讽刺他、否定他啊。事实上，“居功甚伟”一词正确的用法是“厥功甚伟”。厥，也有多个义项，其中一个可作文言代词，相当于“其”。那么，“厥功甚伟”的实际意思明白无误了——（其他，他们等等）在某事上的功劳很大，语气、意思都到位了。《清史稿·一百三十七列传》：“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渠魁就歼，厥功甚伟。”可证。

“厥功”被乱用为“居功”，我以为很大的可能是“厥”与“居”的读音有点相近所致。



千秋万岁长乐未央

（篆刻）王鸿定



夜光杯

《战时党员守则》第一条

袁念琪

年代久远的入党申请书、烈士证书，抗战时期参军入党的老兵留下的临时党员证，被战场硝烟熏染过的军毯、父亲留下的奖状……泛黄的纸张、珍藏已久的老物件，揭开了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编者

封面五角星叠加镰刀铁锤的《中共临时党员证》，属于我的父亲吴早文，时任华野1纵3师政工队副队长。

七十三年过去了，手刻油印的纸已经泛黄，边有几处卷起了角。按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使用规定》，“此证只限于负伤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当你负伤离开原组织关系所在的部队，它能证明你的党员身份，更让你不忘党员的责任和使命。证上有《战时党员守则》十二条，第一条就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战争时期一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体现。

长19.3厘米，宽12.8厘米的《中共临时党员证》，记着部别、职别、何时入伍、候补期等；“何人何人介绍入党”栏写着“徐黎”。父亲1944年12月25日入党，徐黎是他所在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队支六中队指导员。他是南汇六灶申家宅人，抗大毕业。

1945年8月18日，淞沪支队攻打李家桥的上海市保安队二团一大队顾桂秋部及南汇县保安队3个中队。教导员徐黎带队主攻，

最后只剩顾桂秋凭借炮楼顽抗。这时，天已大亮，徐黎在炮楼前的桥附近腿部中弹，他坚持不下火线，直到炮楼拿下才离战场。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25岁。

此战俘敌537名，活捉顾桂秋。缴迫击炮1门，重、轻机枪6挺及大批武器弹药；不仅创下淞沪支

172团1营3连连长杨根思，在围歼长津湖下碣隅里美“重装备典型”王牌陆战1师战斗中，拉响10公斤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获志愿军特级英雄和朝鲜共和国英雄称号。60师不仅创造朝鲜战场瓦解敌军范例——德赖斯代尔遭队建制投降，并诞生了可歌可泣的冰雕英雄连——在门岬阻击北上援敌的180团2连全部冻死在1801高地。

父亲讲抗美援朝不多，一个细节印象至深：部队炸桥切断美军退路，直升机吊来钢板架桥，煮熟的鸭子飞了。这是我闻所未闻，在电影《奇袭》中，方连长率侦察队炸康平桥断敌退路，最后大队全歼美军。

事情原来如此。1950年11月28日，60师炸毁下碣隅里与古土水间的水门桥。美运输机空投钢制车辙桥板和木制车辙桥组件钢板等，使美军于12月10日突出包围。我在父亲参加撰写的《第二十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里没见此记录，却读到这段文字：“即使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也不能不限制我们取得更完满的胜利。”

我家有一条令父亲自豪的军毯，这条军毯陪伴了他74年。

责编：王瑜明